

“宗教冷战”与美国—梵蒂冈的“神圣同盟”

刘 义 任方圆

内容提要 宗教在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特别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团体梵蒂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之间的“神圣同盟”。冷战之初,杜鲁门总统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私人特使通道,并有意使用宗教话语来表述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美国和梵蒂冈在意大利选举等一系列问题上密切合作,以对抗当时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影响。然而,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的历史矛盾,曾一度使杜鲁门时期的宗教联盟计划受阻。1962—1965年的“梵二”会议倡导和平与对话,并在东西对峙之外提出了南北矛盾的问题。宗教使命和政治利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变奏。1984年,美国和梵蒂冈正式建交使冷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发展为固定的机制性关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里根总统之间的合作是促成冷战结束的重要原因。冷战后的“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宗教对国际政治的持续影响。

关键词 冷战史研究 宗教冷战 神圣同盟 梵蒂冈 美国文明冲突

在关于冷战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宗教或文化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因素。

* 刘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200444);任方圆: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4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基督教本土化进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1BZJ010)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然而,以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新一代冷战史专家,^①正日益拓宽学者们的研究视角,这其中就包括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宗教等因素的重视。如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任马可·克雷默(Mark Kramer)所言,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许多学者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但就其实际影响并未能形成共识。^②莱顿大学教授吉尔斯·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乌特勒支大学助理教授乔伊斯·塞格尔(Joes Segal)明确指出,冷战是“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间的战争”。他们用“梦想世界”(dreamworlds)的概念来概括东西方阵营解释世界的思想框架。二者都各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且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描绘。当然,这种“梦想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经常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受政治、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已是一个既定的研究领域。^③

21世纪初,都柏林三一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戴安妮·柯比(Dianne Kirby)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讲师菲利普·莫赫兰贝克(Philip E. Muehlenbeck)分别主编了《宗教与冷战》的论文集,对宗教在冷战中的作用予以充分关注。^④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宗教与冷战”(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或“冷战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Cold War)的说法,直接提出“宗教冷战”(Religious Cold War)议题。这一词语上的微妙变化无疑更加凸显了宗教对冷战的意义。柯比指出,21世纪的学者们见证了一种学术共识的出现:“冷战有一个宗教的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多信仰的全球现象。”“宗教冷战”不只是冷战时期的副产品,而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复杂综合体。^⑤她认为,宗教既是文化的贡献者也是接受者;它影响主流文化,也被主流文化所影响。“宗教冷战”可以被置于现有的冷战研究成果中,“探索观念、文化及规范的影

① 加迪斯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② Mark Kramer, “Ideology and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o.4, 1999, pp. 539-576.

③ Giles Scott-Smith and Joes Segal, “Divided Dreamworl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East and West,” Peter Romijn, et al., eds., *Divided Dreamworl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East and West*,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

④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hilip E. Muehlenbeck,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A Global Perspectiv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Dianne Kirby, “The Roots of the Religious Cold War: Pre-Cold War Factors,” *Social Sciences*, Vol.7, No.56, 2018.

响,与物质主义的解释互补,加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冷战起因的争论”。^① 波士顿大学帕蒂全球事务学院兼职教授詹姆斯·华莱士(James C. Wallace)认为,“毋庸置疑,宗教在冷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宗教自始至终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宗教不是全部故事,甚至不是事件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②

宗教与冷战的主体,同样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从天主教思想传统的角度考察了冷战的宗教起源和宗教批评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亚萍对冷战时期梵蒂冈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辉则探讨了宗教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问题。^③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贾付强对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以宗教为题的冲突进行了系统研究。^④ 本文将宗教作为考察冷战的一个重要视角,重点探讨:宗教冷战的历史根源在哪里?宗教如何影响了冷战的开启和演进?宗教冷战在哪些方面区别于冷战,并因而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宗教对于冷战的结束有何作用?本文以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为案例,参考了双方领导和关键人物的传记和讲话、相关档案资料和媒体报道,以及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结合双方互动的视角,对宗教冷战的特征和进程予以专门探讨。

一、“宗教冷战”溯源:两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漫长的19世纪始终面临着现代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被教会视为所有罪恶的根源。1869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试图维护教宗的地位,却展现出极端保守的态度。随着意大利完成统一和定都罗马,教宗的权威逐渐限于道德和精神领域。在现代国际关系的体系,教廷依旧怀有“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梦想,反对由世俗的民族国家主导

① Dianne Kirby, “The Religious Cold War,” in Richard H. Immerman and Petra Goedd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40-564.

② James C. Wallace, “A Religious War: The Cold War and Relig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5, No.3, 2013, pp. 162-180.

③ 彭小瑜:《冷战的宗教起源与宗教批评:从教宗庇护十二世到修士默顿的天主教思想传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98—109页;王亚萍:《冷战时期梵蒂冈的外交政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3—83页;罗辉:《宗教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一辑),上海书店2014年版,第165—196页。

④ 贾付强:《宗教与冷战初期的美苏外交研究(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的国际秩序。^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教廷来说是一个大觉醒的时刻。”^②在战争的高峰阶段,圣座(the Holy See)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秩序的异象——“天主教国际主义”(Catholic Internationalism)。它指一种基于大公教会传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一种关于未来的愿景”。这也是一种 20 世纪的新发明,体现了对天主教普世主义的诠释和利用。^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副教授朱莉安娜·查姆德斯(Giuliana Chamedes)在《20 世纪的十字军》一书中写道:

直到激烈争议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教宗的国际主义提倡和推崇一种不同的、天主教特色的国际欧洲秩序——它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基督新教或犹太教的),而且实实在在地积极抵御其他审视或存在的方式。教廷反对威尔逊和列宁,开始同致力于推翻巴黎和平协定和共产主义革命威胁的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廷重新致力于在设想的信徒和无神论者、在基督教的守护者和敌人之间竖起一道隔离墙。通过更新协定外交和反共主义动员的文化影响,天主教试图将自身关于欧洲的异象作为 1945 年后秩序的内在部分。^④

1929 年,意大利政府与天主教会签订《拉特兰条约》,以法律形式把梵蒂冈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确定了下来。根据该条约“政治合约”中第 3、4 条,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 city 或 Vatican City,简称梵蒂冈)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具有完整的主权地位。它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国家,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它独立的领土服务于宗座自治主权,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⑤同时,《拉特兰条约》赋予了梵蒂冈城国外交的法律权利。“政治合约”第 12 条规定,梵蒂冈城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互派往来使者。但实际上,梵蒂冈城国不表示与任何国家的外交关系,梵蒂冈城仅仅是为保证圣座的自治权。^⑥梵蒂冈城国以国家的名义存在更多的是为保护圣座的独立主权。圣座

① Gary Lease, “Vat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sm,” in Darrell Jodock, ed., *Catholicism Contending with Modernity: Roman Catholic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Historic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1-55.

② Giuliana Chamedes, *A Twentieth-Century Crusade: The Vatican's Battle to Remake Christian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

③ Ibid., pp. 5-6.

④ Ibid., pp. 14-15.

⑤ 〔西〕阿雷塔:《圣座与梵蒂冈城国》,刘国鹏译,载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研究》(第 23 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15 页。

⑥ Orlando Antonini, “The Diplomatic Activity of The Holy See,” *Megatrend Review*, Vol.12, No.2, 2015, p. 52.

是天主教会在法律上的化身,就像国家是民族的化身一样。^①

“圣座”是教会真正的政治实体、主权实体。圣座的通用含义指,天主教会治理的最高机构,相当于天主教会“中央政府”,以教宗为核心的整个教会中央治理机构,包括教宗及辅佐其处理具体事务的罗马教廷。^② 圣座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政府机构,是从属于教宗,协助其履行管理职责的机构与组织的总称。^③ 只有当梵蒂冈城国、圣座、教宗结合时,以教宗为核心的教宗外交(Papal Diplomacy)才能代表梵蒂冈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教宗(Pope)既是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梵蒂冈这一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元首。教宗站在两者的顶端,基于一种纯粹的宗教力量,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他是宗教、道德、精神、行政、外交、政治事务中的绝对领袖,也是唯一的权力来源。教宗的决定在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教宗的意志就是法律,拥有绝对权威。^④ 教宗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教宗空缺期间,这些权力属于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在外交活动中,教宗以“教会最高牧职”的身份进行交涉,而非以国家元首的头衔。^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国际主义”主要针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秩序。协定外交(concordats)是教廷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罗马教廷逐渐把矛头集中到共产主义上面。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发展,教廷甚至忽略了纳粹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是推动教宗目标的主要民间组织。1931年底庇护十一世发布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发起了影响深远的反国际共产主义的十字军”。^⑥ 同时,教廷开始筹备无神论秘书处(Secretariat on Atheism),并于1935年开始运行。1937年,庇护十一世发布了三份通谕。第一份是关于纳粹德国的,但放弃了曾经讨论过的极权主义问题,也没有批评纳粹主义(特别是希特勒)的思想。相反,《神圣救赎》(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做出了最激烈的批评,将“国际共产主义作为天主教和天主

① Cardinale Hyginus Eugene, *The Holy Se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Colin Smythe, 1976, p. 115.

② 周永:《“圣座”与“梵蒂冈”关系辨析:兼论天主教会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张庆熊、徐以骅主编:《基督教学术》(第1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4—147页。

③ 〔西〕阿雷塔:《圣座与梵蒂冈城国》,第10页。

④ Avro Manhattan, *The Vatican in the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Gaer Associations, 1949, p. 53.

⑤ Jodok Troy, “The Catholic Church: An Underestimated and Necessary Acto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66.

⑥ Giuliana Chamedes, *A Twentieth-Century Crusade*, p. 132.

教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威胁，”甚至是罪恶的化身。^① 因此，即便面临纳粹的挑战，基于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梵蒂冈仍旧采取克制态度；相反，却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这也成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诟病的一个方面。^②

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延续了庇护十一时期的反共立场，并掀开了宗教冷战的序幕。在1944年的圣诞节祝词中，教宗放弃了一贯的谨慎立场，公开批评专制和威权，支持民主。尽管圣座赞同联合国的一般原则，但却对苏联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表示质疑。对他来说，欧洲要想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基督和他的教会”必须是“最终的依靠和指导标准”。^③ 在捷克，他鼓动主教们反对政府的某些立法，结果导致脱离教宗控制的天主教会。在南斯拉夫，由于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压迫塞尔维亚人的主教审判，梵蒂冈与铁托交恶，外交关系破裂。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梵蒂冈也都因为相关的主教与政府冲突。1949年1月，教宗明令，反对天主教徒阅读共产主义的文字材料，也不允许天主教徒加入共产主义组织。“到此时，东欧的宗教冷战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国家政权与梵蒂冈围绕东欧天主教徒的忠诚而形成的争斗。”^④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也是同一时期苏联外交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德国入侵苏联后，卫国战争表现出“圣战”的含义。一方面，这是要抵制德国在占领区对苏联反宗教的宣传；另一方面，则是为团结英、美等西方盟友。^⑤ 谢尔盖(Sergii)在长时期的代理职位后终于正式成为莫斯科牧首，东正教会的活动也得以恢复。1943年，斯大林在会见谢尔盖牧首等人时明确提出“东正教梵蒂冈”(Orthodox Vatican)的说法，其意图主要在反对“罗马教宗与西方联盟的协议”。^⑥ 1948年，在俄罗斯教区成立500周年之际，莫斯科泛东正教会议的召开是苏联在宗教冷战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也是针对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反苏议题的一项努力。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第一项内容主要是对罗马教宗的批评，认为庇护十二世是“残杀兄弟、反对民主、维护纳粹”的始作俑者，并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反对其“反基督教、反民主、反民族”的行为。同时，它也反对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普世运动，认为“其政治活动与正统相悖”，从而督促

① Giuliana Chamedes, *A Twentieth-Century Crusade*, p. 184.

② 段琦：《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

③ Giuliana Chamedes, *A Twentieth-Century Crusade*, p. 238.

④ Peter C. Kent, “The Lonely Cold War of Pope Pius XII,” in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pp. 67-76.

⑤ Steven Merritt Miner, *Stalin's Holy War: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Alliance Politics, 1941-1945*,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11-12.

⑥ Daniela Kalkandjieva,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917-1948: From Decline to Resurr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80-182.

东正教会拒绝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邀请。^① 如此,“天主教—基督新教的西方”与“东正教东方”之间的界限昭然若揭。梵蒂冈被称作是“天主教的堡垒”,美国则被认为是“基督新教的巢穴”。^②

二、美国的宗教外交: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教授罗伯特·福勒尔(Robert Booth Fowler)和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荣休教授艾伦·赫茨克(Allen D. Hertzke)曾指出,美国政教关系有四大基本特征:(1) 清教气质(Puritan Temper):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种宗教的气质;(2) 多元主义:美国宗教的多元主义与新大陆的移民特征密切相关;(3) 福音派特征(Evangelical Dimension):一方面是指坚持《圣经》无误、强调个人救赎、耶稣复活等传统教义的福音派教会,另一方面则是指美国宗教中普遍存在的福音派特征;(4) 平民主义(Populism):与欧洲的建制宗教相比,美国宗教在整体上是草根性、个人性的。罗伯特·福勒尔和艾伦·赫茨克认为,美国政教关系的总体特征在于,一方面是法律机制上的政教分离规定,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中浓郁的宗教因素。^③ 在外交方面,美国的这种宗教气质有着鲜明的体现。这表现为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也体现在美国以宗教为工具的扩张主义。^④ 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宗教外交可谓得到充分体现。参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概念,原美国外交部专家乔纳森·赫茨克(Jonathan P. Herzog)提出“精神—工业综合体”(spiritual-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意指20世纪40—50年代利用社会资源刺激宗教复兴的努力,它是政策制定和神学思考两者的结合。“精神”反映了美国领导人在赋能灵魂方面的努力,“工业”体现了冷战初期的精神隐喻和政策,“综合体”体现了各种动机、行为体和行动错综复杂的结合。^⑤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首任总统,杜鲁门表现出与罗斯福的明显

① Daniela Kalkandjieva,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917-1948: From Decline to Resurr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332-333.

② Ibid., p. 334.

③ Robert Booth Fowler and Allen D. Hertzk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p. 4-27.

④ 关于宗教在美国外交中的体现,参见〔美〕安德鲁·普雷斯頓:《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徐以骅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 Jonathan P. Herzog, *The Spiritual-Industrial Complex: America's Religious Battle against Communism in the Early Cold Wa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7.

不同,冷战与遏制战略成为其执政时期的重要标签。杜鲁门把“冷战冲突视为一场宗教冲突”。^①他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当前首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一种更好的意识形态去打败它。^②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分遏制的一方和被遏制的另一方,二是“宗教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杜鲁门在冷战时期的信念也反映了他“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③在陪同丘吉尔做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杜鲁门在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发表了演讲。他将信仰与自由画等号,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和敌人。他还指出宗教领袖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其国情咨文中,杜鲁门强调:“我们力量的基本源泉是精神的。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民”。^④1951年,在杜鲁门的秘密指令下,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成立,旨在宣传美国的道德并打击苏联的共产主义。同时,一些宗教领袖帮助国务卿公共事务助理起草了《美国情报交换项目的道德和宗教因素》指导书。

杜鲁门把宗教运用在冷战外交中,一边延续罗斯福时期总统私人特使一职与梵蒂冈建立联络渠道,一边通过美国实业家、外交官麦伦·泰勒(Myron Taylor)联络各宗教力量,希望组成反击共产主义的“宗教阵线”。^⑤这一策略旨在打造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战队(Phalanx),把全世界的宗教团结起来,用信神的团结力量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⑥梵蒂冈无疑是实施该战略的最佳伙伴,加强与梵蒂冈的合作可达成这一目的。1946年11月,他在给教宗庇护十二的信函中表示,“团结世界上所有的精神力量,在持久的世界秩序中共创幸福、和平、安全和自由”。^⑦两人计划将不同教派联合在一起,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泰勒与杜鲁门持相似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对抗基督教和民主,这是一个“大问题”。^⑧在杜鲁门的授意下,泰勒以“团结所有人之名”返回罗马,在宗教界内建立统一阵线作为一个反共联盟。1947年,泰勒从事了几周的“精

①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p. 58.

② Francis Rooney, *The Global Vatican: An Inside Look at the Catholic Church, World Politics, and the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oly Se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p. 268.

③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7.

④ Ibid., p. 112.

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就设立总统私人特使一职,任命泰勒前往梵蒂冈就反法西斯同盟问题交涉,并利用此职位长期与教宗保持私人名义的联络。1946年11月23日,杜鲁门重新任命泰勒为总统私人特使。

⑥ Francis Rooney, *The Global Vatican*, p. 268.

⑦ Ibid., pp. 267-268.

⑧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21.

神穿梭外交”，接触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柏林的信义宗主教、伦敦的天主教主教、巴黎的教廷大使以及教宗本人。他希望所有的宗教群体基于两个信仰联合起来，即对神的信仰和对自由的信仰，这将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然而，泰勒的活动遭到美国国内基督新教领袖的反对。1947年10月，他在纽约同几位基督教领袖会面，包括基督教联合会的卡沃特(Samuel McCrea Cavert)和循道会的奥克斯纳姆(Bromley Oxnam)。后者认为，泰勒的活动违反了美国反对国教的传统，天主教和共产主义具有同样的威胁。这种理念上的分歧也影响了杜鲁门和泰勒试图拉拢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努力。1948年，杜鲁门和泰勒试图劝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完成两项任务：剔除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接纳罗马天主教会。然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秘书长胡夫特(Vissert' Hooft)拒绝按铁幕划分阵营。“罗马和日内瓦之间的敌对，伴随着莫斯科和日内瓦之间的明显友好，显然成为阻碍杜鲁门伟大计划的可怕障碍”。^①

无疑，美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合作是杜鲁门时期宗教外交最成功的表现，并对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梵蒂冈欢迎和支持1947年马歇尔计划对战后欧洲的经济援助，称赞美国对战后欧洲重建的贡献。双方之间最成功也最具代表性的合作当属1948年的意大利选举。教廷对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施压和美国的情报工作共同确保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上台，避免了罗马成为“欧洲共产主义之都”的可能。^② 这些合作与共识确保了西方阵营在道义和宗教上的支持，也激励杜鲁门对美梵关系继续保持着乐观心态。1950年1月，年事已高的泰勒辞去私人特使一职。美国政府就美梵关系未来走向面临三种选择：由总统任命另一位私人特使；与圣座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终止所有与梵蒂冈的联系。^③ 杜鲁门倾向第二种选择，任命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为第一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这一任命立即激起美国国内的反天主教情绪，引起新教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抗议。美国国务院收到大量信件，其中大部分来自循道会和浸信会的教会成员，反对继续恢复关系。^④ 1952年1月13日，美国政府撤销了克拉克的任命，这意味着杜鲁门的提议失败。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虽然没能持续杜鲁门时期与教宗的密切关系，但宗教依然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特色，且体现于冷战中坚定的反共主义立场。1953年2月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长老教会，爱德华·埃尔森(Edward

①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32.

② John Pollard, "The Vatican, Italy and the Cold War," in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pp. 103-117.

③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 III,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1790.

④ *Ibid.*, p. 1794.

Elson)牧师为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施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受洗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见证了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确立”。^① 这一方面是为鼓动国内的反共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为削弱国外的共产主义政权。1952年12月,刚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与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见面时指出,美国政府基于一种深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的概念是犹太—基督教的。1953年1月,在就职演说前,艾森豪威尔决定先做一个祷告,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他祈祷全能的主保佑这个国家和人民,同时将矛头指向了无神论的敌人。1955年,美国国会决议,将“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作为国家箴言;1956年,又将“上帝保佑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加入效忠誓言。

艾森豪威尔的宗教情结与美国福音派的兴起相契合,但这与基要派的利益相悖。^② 全美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称赞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前的祈祷。基要派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则反对艾森豪威尔出席在华盛顿给教宗的弥撒,以及参加全美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纽约的大楼剪彩仪式。艾森豪威尔与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将葛培理视为“国内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代理人,以及美国在国外美好愿望的大使”;葛培理则认识到,“总统的支持对于加强其国内外声望的潜力”。^③ 艾森豪威尔在宗教界的另一位密友则是其私人牧师埃尔森。1953年,在埃尔森的提议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社会和公民秩序中的宗教行动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 in the Social and Civil Order)。1954年11月,该基金会召开全国性的宗教会议,邀请了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人士参加。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1956年,埃尔森还以中东美国之友(American Friends of the Middle East)主席身份到中东进行为期六周的访问,并给沙特国王等带去了总统的信件。埃尔森的目的在于,希望联合伊斯兰教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中东的传播。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耶利米·顾恩(Jeremy T. Gunn)指出,1947年后,为了应对实际和假想的苏联威胁,一种新的价值观开始在美国浮现。他称之为“美国的国民宗教”(American National Religion)。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①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257.

② 关于福音派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参见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William Inboden,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276.

政府有神论、超级军事、资本主义即自由。他将此与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所提出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相区别,认为它是“较少来自灵性,而更多是固着于政治”。^①他认为,冷战大大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到冷战结束都还存在。这可能是美国人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一国民宗教也有着明显的“美国”标签。这是因为在欧洲及其他国家,尽管也会有政党提倡宗教,但总有著名领袖来反驳,甚至斥责将宗教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美国,这却几乎变成了一种共识。尽管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的问题,但却无法在公共场合予以明确反驳。然而,杜鲁门本来希望借助英美之间的亲缘关系成立反共同盟,却最终因基督新教世界内部的反对而破产。^②实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曾经是天主教在19世纪最主要的批评对象,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激烈的反天主教传统。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天主教的普世主义和美国的福音派精神却形成一种合流。

三、宗教冷战的变奏:“梵二”会议及其影响

1960年的总统选举反映了美国在宗教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是宗教与冷战关系的一个例外。身为天主教徒的约翰·肯尼迪,曾经也是一名冷战斗士。很多天主教徒期待,这一双重身份将极力加强美国在冷战中的坚定地位。然而,很大程度上为了迎合民主党的自由立场,肯尼迪在竞选中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宗教和政治态度。他试图克服美国民众对天主教的刻板印象,强调天主教身份不会改变其对美国民主体制的认同。在1960年5月的美国间谍机事件中,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后者应该对苏联做出战略让步。肯尼迪的这一态度让许多保守派(特别是天主教徒)感到非常失望。一个保守派杂志甚至刊出《肯尼迪当选总统?天主教神父说“不”》的文章。^③这一“天主教问题”(Catholic issue)一度对肯尼迪的当选造成了诸多麻烦。但基于对美国第

① T. Jeremy Gunn, *Spiritual Weapons: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ging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Religion*, Westport, CT and London: Praeger, 2009, p. 9.

② Dianne Kirby, "Divinely Sanctioned: The Anglo-American Cold War Alliance and the Defen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1945-194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5, No. 3, 2000, pp. 385-412; Dianne Kirby, "Harry S. Truman'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Anti-Communist Front,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the 1948 Inaugural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Vol. 15, No. 4, 2001, pp. 35-70.

③ "Kennedy for President? A Catholic Priest Says 'No'," *Human Event*, July 28, 1960.

一位天主教总统的期待,许多天主教徒还是选择了支持肯尼迪。^①

更大的变化则来自梵蒂冈一方。1958年,号称“冷战斗士”的庇护十二世去世,已经76岁的安吉洛·朱塞佩·隆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当选为新一任教宗,成为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年)。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过渡教宗。不想,他却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改前任的反共态度,将基督教大家庭的和解与世界和平作为首要关注目标。上任后不久,他便提出召开大公会议(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这被誉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会议”,^②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会议的时长和规模,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变化。会议总共通过了十六种重要文件,包括宪章、法令和宣言三个类别。其中,《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提出以“天主的子民”(People of God)为主体的教会,淡化了教阶体系的概念;《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倡导宗教对话;《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us Humanae*)体现了美国天主教的独特贡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以下简称《牧职宪章》)开启了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的对话。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奥马利(John W. O'Malley)在其关于“梵二”会议的经典著作中用现代化、发展、溯本归源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核心精神,同时神恩(charism)、对话、伙伴、合作、友谊等成为关键词。“其目的在于赢得内部同意,而不是外在强制的妥协。它教导,但不是通过建议、暗示、举例而来的宣判式告诫。其方法是劝解,而不是强制”。^③

“梵二”会议的对话精神不仅有助于基督宗教内部的和平交流,也展现在梵蒂冈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交往上。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梵蒂冈从支持西方阵营转变为不结盟;另一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苏联及共产主义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交流与“和解”。若望二十三世表现出与其前任不同的转变,主要呈现在与苏联方面的礼节性交流有所增加,多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呼吁世界和平。因此,这一时期梵蒂冈外交呈现出“天主教缓和”(Catholic détente)的特点。早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教宗对苏联态度缓和的迹象就有所表明。1961年,“柏林危机”爆发,柏林墙竖起。9月,教宗呼吁东西方阵营之间进谈判,结束对

① Thomas J. Carty, *A Catholic in the White House? Religion, Politics, and John F. Kennedy's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113-127.

② John W. O'Malley, *What Happened at Vatican II*,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

③ Ibid., p. 47.

和平的威胁。若望二十三世在冈多菲堡一次祈祷和平的弥撒活动后,面对数千信众,敦促所有政府应铭记他们推动和平的义务。他邀请世界领导人把自己置于良知和上帝的审判前,置于两次世界大战中饱经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面前。教宗谨慎地表达以防有任何偏颇的迹象,并声明教会仅仅出于人道主义。^①在接受苏共的机关刊物《真理报》(*Pravda*)和苏联政府的机关刊物《消息报》(*Izvestia*)的访问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这一呼吁以积极的回应,认为教宗的声明合情合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随后,教宗派朱塞佩·德卢卡(Giuseppe De Luca)神父与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会面,以期后者帮忙改善梵蒂冈与苏联之间的关系。11月,在教宗80岁寿辰之际,赫鲁晓夫还通过苏联驻意大利的大使给教宗发去祝福语,希望后者可以推动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教宗推进和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调停。1962年10月25日,教宗发表《拯救世界》(*Save the World*)的电台演讲,“和平!和平!……我们恳求所有领导人不要将人性的呼唤置若罔闻。愿他们尽其所能拯救和平。……愿他们保持沟通,为真诚而包容的心态,为每个人的良知,为历史”。^②《纽约时报》杂志转载了这一讲话内容。^③10月26日,《真理报》发布报道回应教宗的演讲,赫鲁晓夫对教宗演讲表示赞许。当天,谈判立即开始,还附有一封苏联领导人给肯尼迪总统的私人信件。^④虽然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但最终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苏联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保证古巴独立。尽管教宗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事件并未可知,但这种积极行动表现了“梵二”会议影响下梵蒂冈外交态度的变化。这种态度也与庇护十二世坚定而露骨的反共立场形成明显差异。^⑤纵使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调停“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但他确实为当时的紧张局势带来了一丝和平温暖的氛围。1963年4月11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表《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通谕。他强调,地上的和平必须遵循“神圣确立的秩序”。通谕强调以和平与国家平等、合作、互信取代军备竞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基于两大原则:“真理”与“公义”。每个国家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同时必须尊重其

① Mario Benigni, *John XXIII: The Official Biography*, Boston: Pauline Books & Media, 2000, p. 345.

② Ibid., p. 347.

③ “Text of Pope’s Appe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1962.

④ Mario Benigni, *John XXIII: The Official Biography*, p. 347.

⑤ Gerald P. Fogarty, “Vatican II and the Cold War,” Piotr H. Kosicki, ed., *Vatican II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6, pp. 27-49.

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权利。强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较落后或欠发达的国家。他呼吁各国关注难民的人权,号召停止武备竞赛,禁止核武器。他寄希望于联合国,希望其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保护每个人的尊严。^①

如前所述,作为美国的首位天主教总统,肯尼迪在天主教的问题上表现出异于寻常的谨慎态度。这同样反映于其与梵蒂冈的关系。然而,在梵蒂冈做出积极变革、发出和平与对话的呼声后,肯尼迪不失时机地予以积极回应。在教宗发布《和平于世》通谕后,肯尼迪表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为此感到骄傲。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会从中学习。”^②1962年3月,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在梵蒂冈拜会了教宗。1963年新年,教宗代表向肯尼迪和夫人转达了教宗的祝福。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正式获得国际巴尔赞和平奖之际,肯尼迪向教宗转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认为这个奖项非教宗莫属。^③1963年5月,肯尼迪在欧洲国事访问期间,媒体纷纷猜测他是否访问梵蒂冈。他回答说,六月可能会拜访教宗。^④然而,随即教宗去世,这一拜会最终没能实现。肯尼迪对此深表遗憾,他在给教宗的悼文中指出: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可以“指导现代世界最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他的智慧、同情心和仁慈为人类留下了一份新的精神遗产”。^⑤

继任的保禄六世(1963年—1978年)很好地确保了“梵二”会议的继续,而且以更稳妥的方式确保了会议成果的落实。1963年6月30日,教宗保禄六世举行加冕典礼。7月2日,肯尼迪与保禄六世在罗马会晤。^⑥保禄六世延续了若望二十三世时期的冷战政策,试图保持微妙的平衡。他提出“东方政策”,把更多的关注从欧洲转向第三世界。^⑦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他称赞联合国代表了“现代文明和世界和平的道路”,是人类追求“终极和谐与和平”的机构。联合国在世俗领域的地位与天主教在精神领域的地位相类似,它们都是独特的、普世的。他呼吁“不再要战争,不再要战争!”,和平才是全人类的福祉。为此,他号召各国放下武器。他高度赞扬联合国在推动和平共处和公共福祉方面的潜在作用,犹如将天国的福音变为现实。^⑧在联

① Dennis A. Castillo, *Papal Diplomacy from 1914-1989: The Seventy-Five Years Wa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20, pp. 178-180.

② “Kennedy Praises New Encyclic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63.

③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JFKPOF-31-37-7, April 30, 1963.

④ “Kennedy to Visit Pope late in June,” *New York Times*, May 18, 1963.

⑤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JFKPOF-31-37-17, June 3, 1963.

⑥ “President Delays Rome Arrival to Bar Conflict with Papal Rit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63; “Kennedy Third U. S. President to Have Audience with a Pope,” *New York Times*, July 3, 1963.

⑦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Cold War*, p. 181.

⑧ Dennis A. Castillo, *Papal Diplomacy from 1914-1989*, pp. 181-182.

联合国访问期间,教宗还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y Andreevich Gromyko),后者于1966年春天访问了梵蒂冈。越南战争给梵蒂冈的和平外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美国坚信自身能赢得军事胜利,越南人则对天主教外交持怀疑态度。即便如此,教宗保禄六世在1965年仍旧积极调停。他向南越的阮文绍和北越的胡志明呼吁,希望在圣诞节实行30个小时的停火,最终落实为12小时。他还给南北越的领导人以及涉入越战的中、苏、美领导人写信,呼吁他们结束战争。^① 1967年1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博德戈尔内(Nikolay Viktorovich Podgorny)成为第一个与教宗会面的苏联国家级领导人。1969年2月和1970年9月尼克松两次与保禄六世会面交流。1970年,尼克松任命美国驻南越前大使亨利·卡伯特(Henry Cabot)为总统派往梵蒂冈的私人特使,由罗斯福巧妙设立的职位得以恢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里根时期。

在协调冷战双方的同时,梵蒂冈还提出了不同的目标。1967年1月,保禄六世成立了教廷的正义与和平委员会(Pontifical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以唤醒天主子民的使命,持续推进发展与和平。1967年3月26日,教宗保禄六世发表《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n*)通谕,提出教会对“全球贫困”问题的关注。他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如果不能适当处理,将会引发革命浪潮。他强调“真正的发展”(authentic development)。这不能只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必须同时考虑发展的价值,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综合的,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他呼吁发达国家对全人类发展的使命,并提出了三点指导原则——互助团结、社会正义和普世慈爱。最后,他指出,“发展”应该是“和平”的代名词。^② 这反映了“梵二”会议后教宗形象和地位的重要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教宗外交已经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主义国际体系,而更强调教宗作为世界公民的普世角色。^③ 因此,在冷战的东西对峙之外,关注以南北差距为特征的发展问题成为另外的选择。

① Ibid., pp. 182-184. 关于越南天主教和政治,参见 Charles Keith, *Catholic Vietnam: A Church from Empire to N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② Ibid., pp. 187-189.

③ José Casanova, "Globalizing Catholicism and the Return to a 'Universal' Church," in Susanne Hoebler Rudolph and James Piscatori, eds., *Transnational Religion and Fading State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1997, pp. 121-143.

四、“神圣同盟”:里根与若望·保禄二世

20世纪80年代,冷战和美梵关系都进入新阶段。1978年10月,波兰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当选为罗马教宗,取名若望·保禄二世(1978—2005年),综合了“梵二”时期两任教宗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继承“梵二”会议精神的意愿。然而,作为天主教历史上的首位非意大利籍的教宗,同时也是首位斯拉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注定将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在波兰的占领以及战后的共产主义政权。通过这些经历,他形成了“文化抗争”的方式。同时,这也塑造了教宗的核心关注,尊重人权和坚持宗教自由。^① 这些经历和观点在冷战背景下将产生特殊的意义。

1978年10月21日,若望·保禄二世继任五天后,在梵蒂冈召开有2000名记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这展现了其作为一名独特教宗的广泛影响。^② 1979年6月2日,若望·保禄二世开启了其作为教宗的第一次国际访问,目的地即其祖国波兰。此次访问以他在华沙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举行公开弥撒拉开序幕。^③ 成千上万的波兰年轻人高举十字架,呼喊:“我们要上帝!我们希望上帝!”^④教宗的访问为之后波兰的变革埋下了伏笔。同年10月,若望·保禄二世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进行会面。在联合国的讲话中,他反思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这也是他在其第一份通谕《人类救赎》(*Redemption Hominis*)中所提及的核心思想。此外,他还专门到美国天主教大学会见了相关主教和神职人员。^⑤ 若望·保禄二世使圣座走上了一条超越“东方政策”的新道路。^⑥ 在拉近梵蒂冈与美国友好态度的同时,梵蒂冈与苏联的关系则开始走向紧张。

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和若望·保禄二世一样,他也是一位坚定

① George Weigel, *Witness to Hope: The Biography of Pope John Paul II*,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9. Michael A. Hayes and Gerald O' Collins, eds., *The Legacy of John Paul II*, London and New York: Burns & Oates, 2008.

② Frank J. Coppa, *The Papacy in the Modern World: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4, p. 204.

③ Paul Kengor, *A Pope and a President: John Paul II, Ronald Reagan,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told 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Wilmington: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17, p. 443.

④ Stanislaw Dziwisz, *A Life with Karol: My Forty-Year Friendship with the Man Who Became Pope*, New York: Doubleday Books, 2008, preface.

⑤ Frank J. Coppa, *The Papacy in the Modern World: A Political History*, p. 206.

⑥ Francis Rooney, *The Global Vatican*, 2013, p. 135.

的反共主义者。里根坚持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希望在其任期内可以结束与苏联的争战。里根被视为一个“自由战士”,他用“十字军”来表述与苏联之间的争战。^① 里根确实比他的前任们表现出更强烈的宗教情结。他重新欢迎葛培理牧师回到白宫,并与纽约的枢机主教库克(Terence Cooke)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里根周边还聚集了一班有着虔诚信仰的同僚,如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副国务卿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大使弗农·沃特斯(Vernon Walters)、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等。这些人在他的决策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里根坚信“美国例外论”的愿景,他强调上帝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信天赋人权以及美国作为自由维护者的角色,预示末日审判的未来。苏联则被视为病症甚至“邪恶帝国”。这导致了里根外交政策压倒一切的使命:“通过美国权力追求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主权,以及消灭核武器带来的末日威胁。”^②

波兰问题成为联系里根和若望·保禄二世的关键点,也是影响冷战进程的重要事件。里根把波兰看作可以摧毁东欧铁幕的弱点,认为教宗在鼓动波兰民众方面将发挥独特作用。^③ 他欣赏教宗1979年的波兰访问,关注了教宗在波兰的演讲,认为教宗的访问是“进入共产主义地界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楔子”。^④ 1981年,波兰宣布戒严令,进一步促使了二者之间的合作。中情局局长凯西等美国高级官员多次拜访教宗,与梵蒂冈交流情报信息。1982年,基于美梵双方的政治需求和双边领导人的诸多共同点,双方开启了所谓的“卡布奇诺外交”(Cappuccino Diplomacy)。^⑤

1982年6月7日,里根和保禄二世首次正式会晤。在这次会晤中,里根回顾了两人各自在一年前遇刺及死里逃生的经历。这让他们相信是上帝保佑了自己,并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他们关注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的统治,波兰问题成为双方合作的第一个焦点。里根和杜鲁门一样,他们都认为军事和经济手段只是战略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为人类灵魂而进行

① Paul Kengor, *The Crusader: Ronald Reaga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6.

② William Steding, *Presidential Faith and Foreign Policy: Jimmy Carter the Disciple and Ronald Reagan the Alchemi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07.

③ Andrew M. Essig and Jennier L. Moore, “U. S. -Holy See Diplom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Relations, 1984,” *The Catholic History Review*, Vol.95, No.4, 1984, p. 746.

④ Paul Kengor, *A Pope and a President: John Paul II, Ronald Reagan,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told 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17, p. 536.

⑤ 里根政府的官员威廉·克拉克和威廉·凯西定期与梵蒂冈枢机主教和代表会面。他们在罗马期间讨论波兰问题,与教宗保持联系。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上等的卡布奇诺在美国较为稀缺,他们在通话过程中会有“你想来点卡布奇诺吗?”作为密语,表示是时候去见枢机主教了,以防止电话被窃听。

的战斗。^① 里根将圣座看作是对抗世界邪恶势力的强大精神力量,教宗则认为美国在实现世界和平的使命方面有着特殊的职责,此次会面激发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意愿。^② 这次正式会晤促成了双方就波兰问题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情报交流,使双方达成更紧密的情报关系,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教会可追求其政治目的、使波兰重返自由的舆论氛围。^③ 为此,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出名的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时代》杂志中用“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一词来形容里根与保禄二世之间在波兰问题上的合作。^④ 但后来双方都予以辟谣,认为只是有共同的利益和行动,而并不承认是“联盟”或“阴谋”。

1983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提出恢复与梵蒂冈外交关系的议案,他说:“实际上只有美国是没有与圣座建立全面和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梵蒂冈是一个重要国际联络点,是重大情报和外交联络的聚集点。”^⑤ 该法案于11月1日通过,并于12月15日交换了美梵外交照会。虽然出现了抗议活动,但美国国务院指出,106个国家与梵蒂冈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因为美国承认的是圣座,而不是罗马天主教会。^⑥ 1984年1月10日,里根政府宣布正式“恢复”与梵蒂冈的全面外交关系,从而将美梵关系更加稳固地确定下来。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对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为驻梵大使的任命。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可了圣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⑦ 1984年1月10日,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我们尊重教宗和梵蒂冈在全世界发挥的伟大精神和政治影响力”,“我们钦佩他捍卫西方文明的勇敢立场。”^⑧ 随后,皮奥·拉格吉红衣主教(Pio Laghi)被提任为梵蒂冈驻美大使。这是自1797年美国给教廷派代表以来双边关系发展的最高级别,它打破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体制性束缚。^⑨

① Francis Rooney, *The Global Vatican*, p. 137.

② Avro Manhattan, *The Vatican in the World Politics*, p. 31.

③ Jo Renee Formicola, “U. S. Vatican Relations: Toward a Post-Cold War Convergence?”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38, No.4, 1996, p. 808.

④ Carl Bernstein and Marco Politi,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Our Times,” *Times*, February 24, 1992, pp. 38-45.

⑤ Dennis A. Castillo, *Papal Diplomacy from 1914-1989*, p. 201.

⑥ “U. S. and Vatican Restore Full Ties after 117 Year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84.

⑦ 根据1984年1月盖洛普民意调查,超过57%的美国人支持与梵蒂冈建交,只有24%持反对意见。参见Marie Gayte, “The American Recep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tican in 1984,”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54, No.1, 2012, p. 41.

⑧ “We Respect the Great Moral,”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84; “A Sensible and Long Overdue Mov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1984.

⑨ Andrew M. Essig and Jennifer L. Moore, “U. S. -Holy See Diplom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Relations, 1984,” pp. 741-764.

事实上,尽管教宗和里根在反共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共识,但这却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方面。若望·保禄二世的确与两位“梵二”会议时期的教宗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更接近于冷战初期的庇护十二世。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望·保禄二世也继承了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关于和平与正义的观点。若望·保禄二世最重要的遗产实际上体现在宗教复兴和人权议题上。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教宗指示下属的宗座科学院仔细调查核战所可能造成的生命影响。这对美国的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里根不得不动员各种力量力求减低教宗在此问题上的公共影响。1983年,教宗访问拉丁美洲,他公开批评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然而,他持续强调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希望美国可以带头削减落后国家的债务。1987年,里根第二次访问梵蒂冈,特别希望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得到教宗的支持。教宗承认民主的重要性,但也强调更广泛范围的正义问题。^①

如果说宗教并不一定是冷战发起的重要原因,但却一定是冷战结束的关键因素。若望·保禄二世在波兰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已经毋庸置疑。这既有象征意义层面的精神支持,也包括暗地里的情报和物质支持。^②有学者认为,“1979年的访问就在当选教宗八个月后,它提供了社会动员的道德能量和语言,这最终导致1980年8月的《格但斯克协定》以及后来团结工会的兴起。1983年的访问帮助波兰人度过了《戒严法》以来的寒战,得以维持希望。1987年的访问重新唤醒了逐渐冷却的能量,为1988—1989年的谈判转型铺平了动力之路。从1991年的访问开始,这变成了为新的社会契约而斗争的重要因素,为波兰日益兴起的民主提供了参照。一路走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重塑了波兰的民族身份,为波兰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提供了新的异象”。^③

2005年,当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其对世界的影响被称与丘吉尔相比肩。1989年波兰的变革被认为是一系列历史因素促成的结果。后来波兰及世界情势的演化,对教宗来说并不尽如人意。然而,若望·保禄二世在这一剧变中的关键角色说明,“宗教信仰仍可以改变历史”。^④

① Marie Gayte, “The Vatican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 Cold War Alliance?”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97, No.4, 2011, pp. 713-736.

② David P. Burns, “The Laying of Hands: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Catholic Church’s Political Role in Poland Pre- and Post-1989,” Joseph R. Blaney and Joseph P. Zompetti, eds., *The Rhetoric of Pope John Paul II*,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p. 151-172.

③ Cezar M. Ornatowski, “Rhetoric of Pope John Paul II’s Visits to Poland, 1979-1999,” Joseph R. Blaney and Joseph P. Zompetti, eds., *The Rhetoric of Pope John Paul II*,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p. 103-150.

④ George Weigel, *Witness to Hope: The Biography of Pope John Paul II*, p. xii.

波兰的变革也证明了在东欧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教宗所期待的天主教欧洲理想正在实现。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教宗对解放神学的批评也压制了古巴革命可能引起的社会主义浪潮。有意思的是,冷战促使了美国天主教自身的调适,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和世界天主教的大家庭;同时,冷战还促使了美国政治福音派的兴起。^① 一个是世界性的精神领袖,一个是世界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国和梵蒂冈的合作确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从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双重打击。这也让人们期待美国和梵蒂冈在冷战之后能有持续的合作。^②

结 语

冷战的结束是否意味着西方—基督教阵营的胜利呢?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论断的,表明了“历史的终结”或“意识形态的终结”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在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③ 宗教被视为是文明的内核。亨廷顿由此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不证自明的预言,也有人将此描述为十字军东征的再演。曾担任美国宗教学会主席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休杰出教授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rgensmeyer)则将宗教民族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描述为一种“新冷战”。这后来演绎为宗教游击战反对世俗民族国家的“全球叛乱”。^④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圣战”话语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体现恰恰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希望呼吁英殖民国家的穆斯林发起对帝国主义的内部挑战。同时,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竟然可以追溯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支持的“圣战士”。以宗教为媒介的冲突,贯穿了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的整个历史,且依旧在后冷

① D. G. Hart, *American Catholic: The Politics of Faith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gela M. Lahr, *Millennial Dreams and Apocalyptic Nightmares: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Political Evangelic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Jo Renee Formicola, “U. S.-Vatican Relations: Toward a Post-Cold War Convergence?” pp. 799-815.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④ Mark Ju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ark Ju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战的世界里延续。

对冷战而言,宗教究竟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是否可以称之为“宗教冷战”呢?显而易见,宗教不仅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成为考察冷战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然而,如果要将冷战称为一场“宗教战争”,将美国与梵蒂冈之间的联合称为一种“神圣同盟”,那无疑是对历史的极度简化,也不利于对冷战研究的深入考察。客观地讲,考虑到宗教在美国、欧洲及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宗教因素的专门考察大大深入了冷战的意识形态维度。如果说意识形态主要是聚焦于政治思想的层面,宗教则带给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的纵深,并相应地指出了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宗教冷战”的另一个维度,体现了相对于军事斗争的“冷”,也反映了超越常规的“战”。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冷战意味着“长和平”,似乎也无可厚非。

从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视角来看,研究宗教在冷战中的地位有什么意义呢?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①另一位神学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nikar)也曾说,和平“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宗教问题”。^②如果说人类的冲突无可避免,而暴力也一直贯穿于各大宗教的历史,那么,宗教作为冲突因素的同时也必然代表着一种解决的路径。对梵蒂冈而言,和平一直是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梵二”会议更是留下了促进宗教对话、强调正义和平的遗产。

① [德]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V页。

② [西]雷蒙·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